

滇西擺夷之現實生活

一百 著 樟 江應林 晓注

僰夷俗寫做擺夷，

便是人種學（Anthropology）上通稱的僾（Tai）或掸（Shan），主要分布在雲南、緬甸、安南、暹羅鄰接的區域中，

據英人 William Clifton Dodd 的調查，

全族人口共約二千六，

其中又分作有文字和無文字兩系，

有文字的約一千三百万。

分布在暹羅境內的約一千万，

安南一百五十万，

緬甸一百万，

雲南一百万。

（凡 William Clifton Dodd: The Tai Race）

22.952
186-1

滇西擺更之魂寶生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江应樑
江晓林

笺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江应樑 著 江晓林 签注

—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3. 12

ISBN 7 - 80525 - 798 - 1

I. 滇... II. 江... III. 傣族—社会生活—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现代 IV. K28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3129 号

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

江应樑 著 江晓林 签注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潞西市青年路 1 号

邮 编 678400

电 话 0692 - 2124877 0871 - 5337777

网 址 www. dmpress. net

策 划 李 嵘 思继春 方 萍

责 任 编 辑 王稼祥 罗 宁

责 任 校 对 金 锋 汪 榕 杨 君

封 面 设 计 毕继光 李维冉

版 式 设 计 毕继光 汪 榕

印 刷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版 本 889 × 1194 1/32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张 14.5

印 数 400 千

印 数 1 - 3000

ISBN 7 - 80525 - 798 - 1/K · 171

定 价:38.00

第一章 摆夷的來歷

擺夷即種族系統

撫典漢

撫漢興南詔

擺

漢助後羅跋殘

撫漢興西漢

南詔

混

居漢水西南岸

撫雲貴名故

混

楚夷俗客作擺夷，便是人類學

(Anthropology) 上

通稱的詞 (Tzai) 或掸 (Shan)

，其主要分佈地

，細甸，安南，暹羅都接壤的底地半，撫英

(S.E. Shillips)

Plefton Dodd 的調查：全桂人共約二十萬，其中

又分佈有文字和無文字兩系，有文字的約一十三萬

餘萬，分佈在是羅境內的約一千萬，安南一百五十

萬，細甸一百萬，雲南一百萬(註二)。英 (Ed. Davies)

小雲南境內住民有四大系：

(註二)

关于《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 (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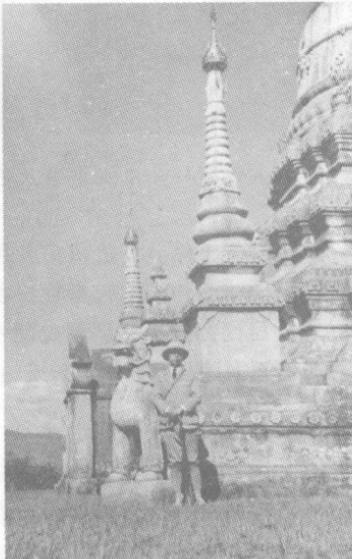
江晓林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先父江应樸先生受广州中山大学研究院和当时云南省政府之共同派遣，以“云南西部民族考察专员”的身份，对滇西民族进行考察。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傣族。这次考察的起因要追溯到半年前：一九三七年春，中山大学研究院和岭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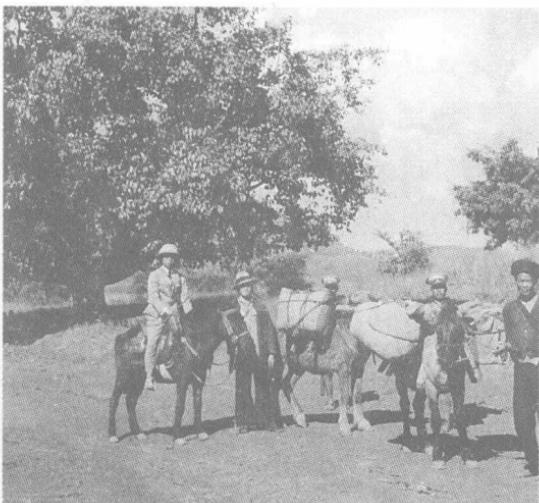


江应樸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摄于1936年）



江应樸在腾龙沿边考察（1937年摄于遮放大金塔，此塔已毁于“文革”中）

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了一个海南岛黎、苗考察团，在杨成志教授的带领下^[1]，对五指山黎族、苗族进行人类学调查，江应樸是考察团成员之一。这次考察的结果在广州举办了一个展览，并引起很大轰动。为了进一步研究百越民族的情况，中山大学决定派江应樸到云南对傣族进行调查，因为黎族和傣族同属百越体系。随即，中山大学给云南省政府发函，请求合作。不久，



初入傣区——由龙陵进入芒市（摄于 1937 年）。

骑马者为作者；戴毡帽者是昆明教育局工人，由他陪同作者前往考察；右立戴包头者是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派到龙陵接作者的人；二携枪者系龙陵县政府派出护送的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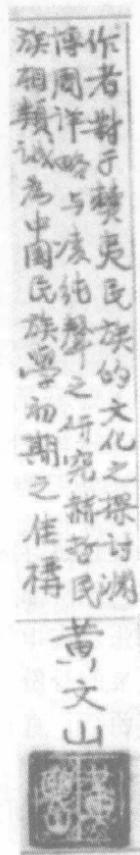
土匪骚扰；从昆明到思普沿边，道路就更艰险，没有任何公路，全部里程都得骑马或步行，沿途往来行人很少，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仔细斟酌后，他决定去腾龙沿边。

云南省政府同意均摊调查经费，双方各出一千块大洋。于是，他来到昆明。当时，傣族被称为“摆夷”，主要聚居在思普沿边（今西双版纳）和腾龙沿边（今德宏）两个地区，由昆明到这两个地方都很不方便。从昆明到腾龙沿边，可

以由刚刚修通的昆明至大理的公路乘汽车到大理，大理以西，便只有骑马或步行，要翻越高黎贡山，渡过澜沧江和怒江，路途十分艰难，还时有

自大理起，“改用步行或乘马绕苍山经漾濞、永平，过澜沧江而至永昌（今保山），南过怒江至龙陵，自龙陵南下即入摆夷土司区。计所考察到者有九土司地：曰芒市安撫司（今潞西市大部），遮放副宣撫司（今潞西市遮放镇），猛卯安撫司（今瑞丽市大部），陇川宣撫司（今陇川县大部），户撒长官司（今陇川县户撒乡大部），腊撒长官司（今陇川县户撒西北），盏达副宣撫司（今盈江县一部），千崖宣撫司（今盈江县一部），南甸宣撫司（今梁河县）。自梁河县折出腾越，过高黎贡山、怒江而回抵永昌，然后再沿来路经昆明返广州，为时共十个月”。他在给中山大学的报告中这样叙述这次历程。

回到广州石牌，根据这次考察所得到的资料，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日本飞机狂炸广州的炸弹声中，他写了近二十万字的《滇西摆夷研究》一稿，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此书稿经黄文山先生审阅^[2]，认为“作者对于僰夷民族的文化之探讨渊博、周详，略与凌纯声之研究赫哲民族相类，诚为中国民族学初期之佳构。”一九三八年，北方许多大学已南迁昆明，西南联大已经成立，全国很多学者、教授云集昆明。中山大学也准备迁滇。江应樑先行到昆，正好，中央振济委员会和云南省政府组织滇西考察团，邀请在昆的各个有关学科的学者二十多人参加。考察团成员为：西南联大古生物学教授张席示考察古生物，社会学教授李景汉考察社会，生物学教授李继侗考察生物，地质物理气象系主任孙云铸考察气象，水利系助教吴尊爵考察水利，农学系助教吴征镒考察农产；云南省卫生实验



黃文山
对作者所著
《滇西摆夷研
究》作的评
语



(左)1938年5月16日，《中山大学日报》刊载作者由滇西傣族地区考察后返校的消息



(右)1938年10月21日，《云南日报》刊登有关多学科考察团将前往滇西考察的消息

处处长姚寻源考察医药卫生，云南省建设厅技师郭文明考察农事；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宋达源考察土壤；北平研究院调查员张宏吉担任测量；江应樸以中山大学研究院暨云南大学特派调查员的身份考察民族。这时，滇缅公路已经修通，考察团一路乘车西行，直到中缅边境，共历时二月。这是他对滇西民族所做的第二次考察。一九三九年，他以这两次实地考察的资料，在《滇西摆夷研究》书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一书的写作。一九四零年，这部稿子经顾颉刚先生联系，决定由国立编译馆付印出版。但由于该馆新迁重庆，书中所附的百余帧照片印刷困难，编译馆提出抽去照片，只印文字。家父认为这批图片资料很有价值，如不附图，宁可不出版该书。最后，连寄出的那份稿子也不知所终。

解放后不久，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遭到封杀，他所在的云南大学社会系被取消，他被转到历史系任民族史教学工作，只能单纯地埋头故纸堆寻觅史料。至此，这本书不要说出版，原稿也惟恐被人知道而罹祸，自然只有深藏箱箧了。之后的十多年里，出版是无望了，可父亲一直舍不得把稿子毁掉。碰到“风声”紧时，他悄悄把它取出，将其中某些“犯忌”的内容划掉或撕去。今天在整理这部书稿时，为补齐这些为避祸而撕掉的部分颇费周折。

“文革”初，抄家之风愈演愈烈，云南大学校园中“红色恐怖”日甚一日，几乎天天传来某某教授被抄家，发现“反革命罪证”的消息。一天，听说中文系主任刘尧民教授被抄家，其手稿、书籍被当面焚烧。老教授曾跪下请求留下手稿，反而被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不久，又传来校长李广田教授的日记被抄走的消息……父亲把一些手稿和善本古籍包好，让我陆续转移到几位当时处境还算安全的亲友处，其中也有这部《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原稿。浩劫后，我去这些亲友家重新取回当年他们冒险保存的书籍，十年沧桑，积存的不少书籍已经散失了，而这部书稿却幸存下来。而我也是到取回这些东西时才第一次知道有这部书稿的存在。

(二)

今天，由昆明西行，到与缅甸毗邻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飞机仅仅四十五分钟的航程，乘车从高速公路走也只需十小时左右。但在六十多年前，当时被称为腾（冲）龙（陵）沿边的这片土地，却被内地人视为酷热卑湿、蛮烟瘴雨的蛮荒之地：外人进去，十之八九会中瘴毒而亡。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具有种种魔幻蛊惑的神奇力量；汉人到此，稍有不慎，就会被邪魔所惑而不能返乡……诸如此类不经的说法，不但在内地汉人中广为

流传，而且千百年来，言之凿凿，史不绝书，显得不可思议的神秘和恐怖。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当地设置了相当于县的建制的设治局，但并未取消元、明、清以来一直延续的土司制度，那里仍然保留着几百年来几乎不变的政治经济形态，与内地交流甚少。当时德宏临近地方（如龙陵、腾冲、保山等地）有少量的汉人到傣族地区，被称为“走夷方”。“走夷方”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在内地确已无法存活，不得已到那里谋生；一是在内地犯事，到那里逃避官司；一是贩运鸦片以谋暴利的妄为之徒。那里一年分为旱季和雨季两个季节，他们“走夷方”都是每年霜降以后进去，次年清明前离开，以躲避雨季的“瘴毒”。而各设治局驻地都不在各土司司署所在地，而是在地势较高，气候相对凉爽的地方。这样是为了避免与土司在政治上发生冲突，同时也有避酷热卑湿，躲蛮烟瘴雨的考虑。设治局的官员大都是些失意的小政客和失势的小军官，不得已到了那里，奉行“三不一吹主义”，即不起早、不吃饱、不娶小（小妾）和吹鸦片烟（云南人把吸鸦片称作“吸烟”）。“三不”的用意是保存体力，以避“瘴毒”；而“一吹”的目的则是用鸦片来“抵御瘴毒”。他们一心只想保住性命，敛些钱财，熬过任期，根本不敢走入民间，更遑论体察民瘼、了解民情了。因此，这里依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一个保留有古老而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的社会，是一个外人所知甚少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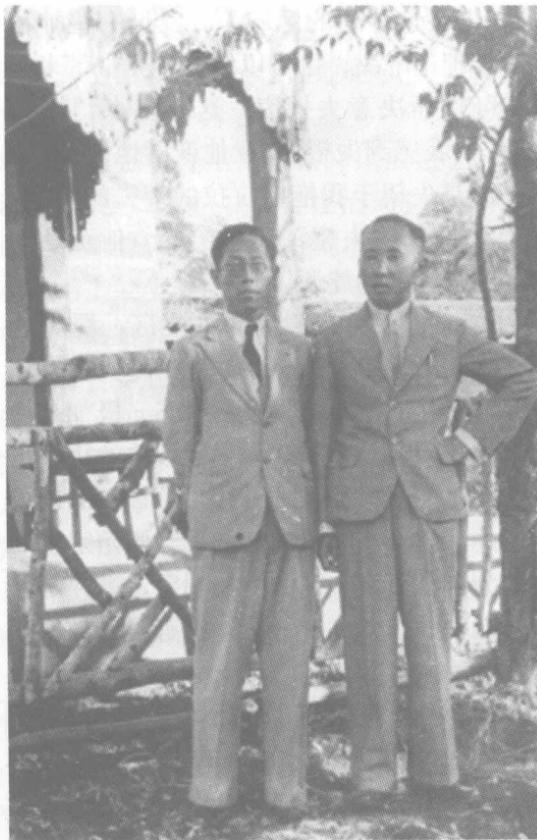
江应樑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人类学者身份进入高黎贡山以西对傣族社会进行民族学研究的人。

他是勇敢的。他说：“当我决定到那里时，多年住居云南和云南本籍的许多亲友，始而奇怪我为何胆敢独个人到蛮烟瘴雨的边地中去，继而知道我要去的是摆夷区，更以为我是发狂了。摆夷，在滇黔一带汉人的观念中，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具有多种邪魔力量的人类。提到摆夷区域，他们的脑里都会浮起一种魔幻的阴

影。亲友们善意告诉我若干在摆夷区域可能遇到的奇事，什么夷女下药，什么夷人变形等。意思是要善意地阻止我的行程。而我，正被这些神秘得富有原始意味的奇事所引诱，谢绝了他们的劝阻而确定了我的行期。关怀我的人们见我去志已坚，便把许多避免和破除此诸种魔邪的经验良方教给我。”“而诸如此类的话，也说得我有些疑虑起来，以为夷地中恐真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我最初之信念，很想在这神秘的区域中，发见一些神秘的原理，纵不能即时以科学理论解决，也可以给科学界中带来一些研究的资料”。明知其可怕而决意去探究，这要有点“吃螃蟹”的精神。实地进去后，“我感到失望了”，他诙谐地说，“不是失望于我被邪魔征服，而是失望于我拖拖拉拉的带去的炊具，完全原封不动地带回汉地来”。^[3]“失望”是句笑话，他正是从傣族神秘的信仰中，追寻到那古老的族源。

他也是幸运的。千百年来，这里被视为化外之区、羁縻之地，由于边远的地理环境，高山大川的阻隔，语言的障碍，使这里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极少有外人能进入这个区域。这里处于南亚与中国两大文化板块的挤压之间，而又有自己独特的文明。这里特殊的延续了数百年的世袭领主政治体制，无工商业的纯农耕经济，南传佛教与原始宗教的奇妙共处，外来文字嬗变为自己民族文字的文化现象，迥异于汉地的风俗习惯，数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即使有，也是极其缓慢地、以其自身的规律在发展、变化。外来文化（如由缅甸传入的上座部佛教，由腾冲、龙陵辐射而入的汉族文化以及近年来西方的一些器物，或许还有某些近代思想）的影响一直是以一种自然的、渐进的、缓慢的形式进入该地区。因而那里犹如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精心保存的原生地，是人类学者研究的一个宝库。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就在他第一次考察结束后不久，随着抗日战争形式的变化，随着滇缅公路的贯通，腾龙沿边

由闭塞的边陲变成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外部的力量和影响急剧地进入这个地区。此后的十多年中远征军从这里到缅甸、印度，日本军队的入侵和占领，国民党军队的光复，旋即又从这里溃败逃窜，新中国的诞生，土司制度的永远结束……这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而他，恰好在巨变前夕对那个社会进行了人类学考察，并留下宝贵的记录。



作者（左立者）与芒市安抚司代办方克光合影于方之私邸 1937 年摄

他带着一名随从（当时昆明县教育局借给的一名工友），毅然离昆西行。经安宁、禄丰、楚雄、镇南（今南华）、祥云、凤仪到大理。离开大理时，买了一匹马，驮着摄影器材、温度计、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工具、简单的行李和炊具，顺千年古道，渡过澜沧江、怒江，翻越高黎贡山逶迤西行，沿途进行考察。跋山涉水、顶风沐雨、风餐露宿的艰辛自不必说。最麻烦的是许多地方强人啸聚，土匪出没。遇到有土匪的路段，或请

当地政府派兵护送，或等待商旅结伙同行。走了二十天左右，到达龙陵县。这时已经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再往前，就进入傣族土司区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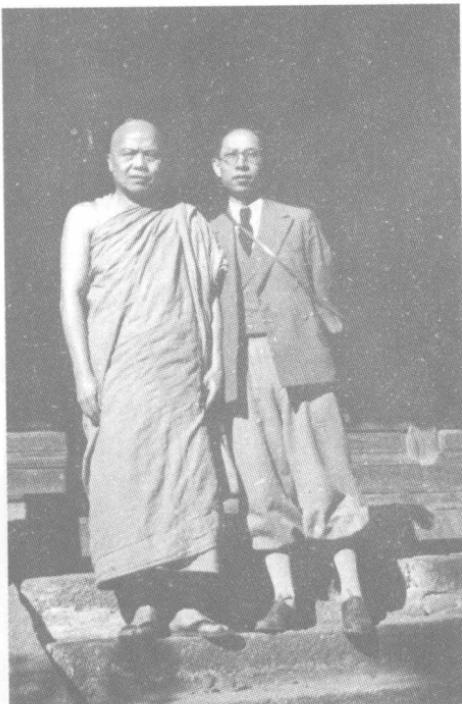
从十月初到次年四月，他在腾龙沿边土司区逗留了半年左右。近五十年之后，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次经历：

“汉官吏统称为委员，进入傣族地区是不受欢迎的。我在龙陵，听说芒市的土司方克光曾到过缅甸、南京等许多地方，是一个开明人士。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身份：是学校派去考察他们的社会和历史的，请他给予帮助。两天后，方克光就派人到了龙陵，接我去芒市。”

“出龙陵，下一个大坡，就到了傣族地区。在我眼前展现的是一派完全不同于汉族地区的景观：坝子被乳白色的雾气笼罩着，薄雾中隐隐显出一丛丛竹林。每一大丛竹子里，就是一个傣族寨子。这里的竹子和汉地的略有不同：茎叶粗大非常茂盛，即古书上所谓的‘濮竹’。据说，这种竹子‘竹节相去一丈’，现在看来，也不过一二尺的间隔。出了竹林外，随处可见的便是大榕树，当地人称作大青树。几乎每个佛寺前都种有这种树。人们不去砍它，称之为‘龙树’。大青树枝繁叶茂，其枝节长到一定长度，往往下垂到地生根，其四周又长出一排小树。于是，大青树成了绿荫，人们都到树下乘凉。”

“这时腾龙沿边地区仍然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制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制度《明史·土司传》中记载：‘西南诸蛮……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原其为王朝役使，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及楚庄蹆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延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以即土官土吏之所以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考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司称号，曰宣慰

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之外，皆赴阙受职。天顺末，许土官缴呈勘奏，则威柄渐弛。成化中，令纳粟备振，则规取日陋。孝宗虽发愤厘革，而因循未改。嘉靖九年，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明史·卷310·湖广土司传》）。“方克光打开官府的大门和中厅，率土司署中的官员和贵族站在两边欢迎我，把我迎进花厅里住下。土司署的建筑，完全模仿的是汉地明、清时的官府式样：有东、西辕门，大门前是大照壁，大门头上高悬着‘芒市宣抚司’的金字匾；二门旁陈列着半副銮驾，并‘肃静’‘回避’等金牌；大堂、二堂之后是内堂，又有金碧辉煌精雕细刻的内厅、防卫森严的内衙、暖阁、戏台、曲栋流水的花厅等。住于其中，仿佛似百年前的清贵被迎于督府衙门中。方克光和几个贵族陪我在花厅里吃饭，其余的人则在大堂侧面的走廊上吃。大约有十桌酒席，各桌酒菜依食客的身份地位而轻重不同。桌上的



作者与芒市静修大佛爷合影于菩提寺前 1937年摄

菜也和汉地一样，是些鸡、鸭、鱼之类的，只有一二种菜是傣族地区的口味，而且菜多是油炸的。在座的有一位汉人，是官府里的师爷，专门管理接待汉人的事务，每天陪土司吃饭，地位是很高的。



作者与景颇族合影于遮放土司署前 摄于 1937 年

“这时我才知道，方克光不是土司，只是土司代办。腾龙沿边有两套官制：有正印土司，其职位是世袭制。他是当地政治、经济、军事、甚至宗教的最高领袖。土司的同胞兄弟中年龄最长的一人，称为护印，协助土司料理政事，这是一套官制。如果土司年龄尚小，或因别的原因不能担政事，则有土司的叔父或舅父中的一人替代料理，称土司代办。代办在职期间，其地位和权力完全等同于土司，只是不住在官府。代办的同胞兄弟中，年龄最长的一人，称作护理，其地位和权力相当

于护印，这又是一套官制。等土司满十六岁后，代办又把权力交还土司。方克光是替他侄儿料理政事，作代办。他的弟弟方克胜，则是护理。”

“方克光不住在衙门，在外面有一所房子，式样和衙门差不多，也是砖房。方克胜做护理，也有自己的房子，被称为‘二衙门’。所有这些房子，都是由内地的汉族工匠去建造的。”

“方克光是个很开明的人。他精通汉文，曾到过内地的南京、上海和缅甸去观光，很有见识。他和方克胜都穿着西服，日常用品也多是西式的。方克胜有一辆小轿车，白天，他们多是带上猎枪、猎狗，驾车出去打猎游玩。晚上，则躺在床上吸大烟。他们都是抽鸦片的。我在芒市时，白天正好同他们一起外出，看看民风民情；晚上，趁方克胜抽大烟时，向他了解当地的情况。”

“芒市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分为两季。每年四月至九月为雨季，十月至次年三月为旱季。旱季多雾，每日早晨到十一时左右才能见到太阳；日落后，大雾起来，空气湿度很大。到了雨季，天气湿热，瘴气（其实就是恶性疟疾）很厉害。所以人们说傣族地方是蛮烟瘴雨。我在芒市一月，每日起得早，吃得很饱，又不抽鸦片，却亦没有什么病痛。”

“傣人主食大米，这个地方的大米米质极好，据说亚洲水稻的发源地就是这片地方。傣人除了吃猪肉外，也吃牛肉，喜吃水牛，用腌菜合炒或是用油炸了吃。青菜晒干，用水煮熟，而后加入酸木



景颇族住房 摄于 1937 年

· 12 ·

瓜，于是菜变得极酸，人称‘酸巴菜’。另外，油煎青苔、凉拌棕榈树花也是他们独有的风味。傣人嗜酒是有名的，一日三餐必不可少，他们饮的都是米酒，方克光陪我在官署里吃饭，每餐都要喝酒，而我是滴酒不进的。傣人嚼槟榔，用槟榔待客也是颇有特色的。傣族男子则多抽烟筒。”

“有时候，我就住在代办家中，看到不少傣人的风俗。傣家每家都有一个水碓，由家里的姑娘在头天晚上就把第二天吃的米舂出来。姑娘在舂米时，小伙子就到碓房里来谈情说爱。有时是小伙子在竹林里吹起笛子，姑娘听到笛声就去约会。姑娘家人甚至会让出堂房给情人们的。傣族青年男女间非常活泼，别有一番风情。”

“我还认识芒市的大佛爷，法名静修。他每日只在早、晚各吃一顿饭，他吃的东西都是村里人送去的。他虽是‘忌午’，但却可以吃牛奶这样的乳制品。村人们送去的水果很多，常常吃不完，我没次去拜访他，都能吃到许多果品。”

“在芒市一个多月，和方克光他们相处极好，相互之间也很融洽。他曾对我说：‘土司确实是剥削百姓，可是这是有个限度的，必须在百姓可以承受的限度内。而汉官到了傣族地区，剥削百姓无所节制，如吸血鬼，傣人都很恨他们。在傣人眼里，汉官到了夷地，除了要钱，别的什么都不会做。我在芒市期间，曾有几次汉官下去，确是去收钱的，那时，傣人交租，都用实物。各地的头人或土司再把这些实物卖掉，换成钱币。傣族地区通行的是新滇币，即半开银圆。’

“我在芒市受到很好的接待，心里很过意不去。而方克光他们却说，我是汉人，却不向他们要钱，又不抽大烟、玩女人，清廉正直，人品极好。后来，我从芒市到遮放，他们又把我的为人介绍给了遮放土司多英培。于是，我在遮放亦受到热情地款待。”